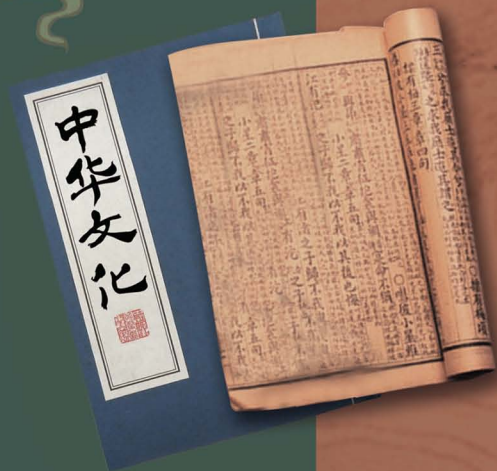


中国

传统文化与典籍论丛

CHUANTONG
WENHUAYU
DIANJILUNCONG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与典籍论丛 /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
研究所编. —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226-04700-2

I. ①中… II. ①上… III. ①传统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2330号

出 版 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李依璇
封面设计：晚 风

中国传统文化与典籍论丛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27.75 插页 2 字数 444 千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ISBN 978-7-226-04700-2 定价：88.00 元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创建于1983年，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科研机构之一。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后，即申报设立了古典文献学专业，并于1983年开始招收本科生，成为教育部在全国布点的古文献学本科生培养基地。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古文献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古典文献学专业则是培养整理古文献、研究传统文化人才的重要平台。上海师大古籍研究所本着出人才、出成果的办所理念，以本科教学为基点，以科研为发展之道，精心教学，勤奋耕耘，获得了人才培养和科研双丰收。三十年来，上海师大古文献专业为全国、为上海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

本书汇集的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古典文献学专业2007级—2010级的25篇学士论文，是从四个年级120余篇毕业论文中筛选出来的，另外有一篇是田野考察研究报告，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多个方面，大致可分为五个板块：文献考订与学术论辩、历史地理研究、古代史研究、古代诗歌和小说研究、语言学研究，涵盖历史、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人文地理、古文献等领域，论述对象的时间跨度从上古到民国。论

文立足于古代典籍，多角度地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年轻的学子们经四年学习后交出的一份习作。这些论文的写作整体来说虽还未脱稚嫩之气，难免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学生们都十分认真，在教师的指导下，将所学专业理论知识运用于对问题的探索、课题的分析，努力作出自己的解答。

我编纂过学者的论文集，但编纂公开出版的本科生论文集还是首次，这在国内也很少见。这是我们进行教学改革的一个尝试，希望以此来检验和促进本科教学质量。编辑这些论文时，我眼前时常浮现课堂上的教学场景，师生之间，教学相长，相得益彰。如今这些毕业生，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为国家奉献着他们的才华。这本论文集既是他们学习成长的一个记录，也可视作近年来上海师大古典文献学专业教学成果的一个侧影。书中的错误，尚企读者批评指正。

戴建国

2014年10月

目录 CONTENTS

编纂弁言 /001

《唐风·蟋蟀》与《耆夜·蟋蟀》考论 韩一舟/001

清华简《金縢》与《尚书·金縢》比较研究 洪莉媛/010

上博简《凡物流形》与《楚辞·天问》比较研究 沈息兰/023

月体纳甲钩沉及其图解辨误 戚子君/034

《不得已》考略 顾伟龄/047

《真腊风土记》浅析 杨韵诗/063

吕惠卿年谱 陆 杰/078

姚际恒《易通论》发现及研究述要 应 莹/103

私家园林与明清上海县城 单 桢/121

晚晴至民国上海民间地图的绘制出版 石冰洁/131

明至民国上海县志舆图研究 李会珍/179

清中叶至民国初法华镇水陆格局的发展与演变 赵方祺/200

汉人晚近开发区域聚落变迁史研究——以台湾兰阳平原为例 周其珩/215

明代台州桃渚城所的构筑及其历史形态初探

夏汇丰 孙昌麒麟 张中媛/246

北魏于忠专权始末探究 黄丹艺/263

唐穆宗长庆间河北藩镇复叛研究 颜逸凡/272

帝王罪己诏与天人感应说 李天爽/293

庭院中的女性文学创作——以沈宜修为例 樊亦青/304

从《本事诗》与《唐诗纪事》论纪事体诗歌批评的发展 付 赫/316

灵一交游与诗歌创作考论 郁婷婷/331

《夷坚志》中的狐题材小说研究 叶莉君/353

古代尸祭及尸字演变探源 张丽华/368

《常语寻源》研究 董裕雯/380

“猿鹤沙虫”考 吴博文/391

《直语补正》的训释特点及文献价值 蒋卉卉/400

钗擘黄金合分钿——明清时期江南园林与昆曲的造境艺术 张 弛/411

《唐风·蟋蟀》与 《耆夜·蟋蟀》考论

韩一舟

一、绪 论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它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即公元前 1100—前 600 年左右的诗歌 305 首。而“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记录的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

《蟋蟀》是《诗经·唐风》的第一篇，但是对其诗义，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歧义。《毛诗序》说：“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悯）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娱）乐也。”清方玉润反驳道：“今观诗意，无所谓‘刺’，亦无所谓‘俭不中礼’，安见其必为僖公发哉？《序》好附会，而又无理，往往如是，断不可从。”苏辙《诗集传》信《毛序》“刺晋僖公也”之说，但认为“此诗君臣相告语之辞”。朱熹《诗集传》不信《毛序》，认为“唐俗勤俭，故其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及其岁晚务闲之时，乃敢相与燕饮为乐而言”^①。宋王质在其《诗总闻》中指出“此大夫之相警戒者也”，而“警戒”的内容则是“为乐无害，而不已则过甚。勿至太康，常思其职所主；勿至于荒，常有良士

^① 朱熹：《朱子全书》第 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97 页。

之态,然后为善也”。释语达理通情,符合原诗。姚际恒《诗经通论》认为“《小序》谓‘刺晋僖公’。《集传》谓‘民间终岁劳苦之诗’”。

2008年7月,一位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而清华简《耆夜》亦有《蟋蟀》一诗,与《唐风·蟋蟀》不仅标题一样内容也可谓是大同小异,这种现象是极为罕见的。然而清华简《耆夜》的出现,不但未澄清《唐风·蟋蟀》诗义,反而带来了更多问题。据李学勤教授介绍,这篇竹简一共有14枚。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在典礼上饮酒赋诗。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秦代以后,乐经已经全部亡佚,因此这一发现更显得很重要。

本文着重讨论简文《蟋蟀》和诗经《蟋蟀》的异同、简文与《诗经》写作的先后问题。

二、简文与原文异同

现收于《诗经·唐风》的《蟋蟀》依阮刻,《十三经注疏》的《毛诗正义》本,全篇是这样的: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无以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
无以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悵?
无以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而清华简中《耆夜·蟋蟀》的行文如下:

蟋蟀在堂,役车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夫日□□,□□□荒。
毋已大乐,则终以康。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遘遘。
蟋蟀在席,岁聿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
毋已大康,则终以作。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思思。
蟋蟀在舍,岁聿云[徂。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除,从冬及夏]。
毋已大康,则终以惧。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思思。”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虽然两篇文章有诸多相同之处(如:都以“蟋蟀在”起

头,都有“日月其迈”“不乐”“良士”“岁聿”等,正文都分三段)。但细看其实是有很大不同的。

首先是句式上。《唐风·蟋蟀》自始至终都是整齐划一的四字句,而《耆夜·蟋蟀》则四字句(蟋蟀在堂)、五字句(康乐而毋荒)、八字句(今夫君子不喜不乐)。例如《唐风》中的“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在简文中对应的“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从八个字拓展到了十六个字,“今我”变成了“夫君子”,“不乐”变成了“不喜不乐”,且在“日月其迈”之后增加了“从朝及夕”。《唐风》里“好乐无荒,良士蹶蹶”,这句在清华简里对应的是“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思思”,“好乐”对应“康乐”增加了“而”衔接“毋荒”,增加了“是惟”衔接“良士”,“蹶蹶”在简文中也成了“思思”。

其次是押韵上,《唐风》三章末句都是叠字押韵的,如“瞿瞿”“蹶蹶”“休休”。第一部押鱼、择部韵,第二章押月部韵,第三章押幽部韵。而简文三章分别以“迨”“思”“思”结尾,第一章押的是阳部韵,第二、三章押鱼、择部韵。且据李国勤先生研究,在简文中“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没有韵脚,八字只好作一句读,第二章中“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韵脚落在了“夕”字上是“疏韵”。而在《唐风·蟋蟀》中,不存在这样的现象。

《唐风·蟋蟀》采用一章中两韵交错,各章一、五、七句同韵;二、四、六、八句同韵,后者是规则的间句韵。译诗保留原押韵格式。

两首诗的意思也大有不同。《唐风·蟋蟀》中“今我不乐”对应简文中的是“今夫君子,不喜不乐”,首先其中出现的“我”与“君子”便有所不同。《耆夜》中有一段记载:“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周公秉爵未饮,蟋蟀跃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故《耆夜》中的“君子”指的便是武王。那《唐风·蟋蟀》中的“我”是不是也是指“武王”呢?在谈到此诗的用意时,《毛序》评:“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悯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毛序》认为“我”指的便是晋僖公,朱熹认为“我”为泛称,指唐地民间,此诗为诗人诗唐俗。姚际恒认为“我”即良士,此诗为士大夫之诗。三种说法都有理可依,但目前没有学者提出依据说“我”与《耆夜》中的“君子”相同。

再次,《唐风·蟋蟀》中“不乐”的意思是不寻乐,而《耆夜·蟋蟀》的创作背景是在大戡后的酒会上,在大家辛苦打了胜仗后进行庆功之时,武王劝酒周公作诗,如果“今夫君子,不喜不乐”解释成“不可耽于欢乐而忘了前途的艰

难”，这是不合常理的。所以我认为曹建国先生讲其译成“丕喜丕乐”（载喜载乐），即当武王凯旋之后在文太室举行“饮至”之礼，其间君臣欢愉赋诗为乐，丕喜丕乐，在众人欢庆之际，周公乃警戒周人“毋已大康，则终以祚”，也是在情理之中^①。由此可知周公作《蟋蟀》的意图是因为君子“丕喜丕乐”而心生忧惧，忧心国祚。而《唐风·蟋蟀》则不然，纵观全诗的重心是在“今我不乐，日月其除（迈、慆）”上的，用意是希望良士及时行乐，行有节制的乐。

三、简文《蟋蟀》、诗经《蟋蟀》的先后顺序

可以肯定的是，两篇《蟋蟀》之间确实存在着渊源，然而其句式、押韵、主旨的显著不同，又反映了他们成篇的时期的差异，对于其中的先后顺序学术界的看法不一。

李学勤教授认为“从《唐风》一篇显然比简文规整看，简文很可能早，经过一定的演变历程才演变成《唐风》的样子”^②。我认为，这样得出的推论显得过于草率了，时代背景等因素很可能导致其文风的转变，而作者的不同也会影响写作水平、诗歌规整度。

已知的是，诗经中收录的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即公元前1100—前600年左右的诗歌，可以推断诗经《唐风·蟋蟀》完成于春秋中期之前，也就是公元前600年之前。

影响简文蟋蟀断代的很大一个因素便是其作者，清华简中记载“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加之历来传说周公制礼作乐，故很多诗篇都附会为周公所作，此处大家自然而然认为这首《蟋蟀》是周公即兴所作。如果《蟋蟀》真为周公所作，那么其成诗年代便是西周初——武王八年，然而仔细推敲发现其即兴而作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简文中“周公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蟋蟀》……周公或夜爵酬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周公秉爵未饮，蟋蟀跃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可知在宴会上，周公是连作歌三首，其数量之多令人称奇。再细看诗歌，清华简乐诗以四言句为主，句式规范，《明明上帝》阳部、东部合韵，偶句用韵。《蟋蟀》在铎部、药部、月部合韵，偶句押韵，首句亦入韵。其用韵之整齐、

① 曹建国：《论清华简中的〈蟋蟀〉》，《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② 李学勤：《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中国文化》2011年第1期。

成熟也令人拍案。在吃饭功夫创作出如此多而且精美的诗篇,专职诗人尚不可做到,况君王将相乎,所以在逻辑上周公即兴作歌是不合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作”在古文中确有“创作”之意思,但也有“演奏”的解释。如,《礼记·乐记》郑玄注“节奏,阒作进止所应也”,孔颖达疏:“阒,谓乐息。作,谓乐动。进则作也,止则阒也。”这里“作”指乐动,可理解为乐曲演奏。《石钟山记》:“如乐作焉。”亦用了此意。所以这里将“周公作歌”解释为周公随乐诵诗更为恰当。

故,《诗经·蟋蟀》可能早已著成,在戡黎饮至礼上,周公只是借《蟋蟀》诗来表达自己的当时“乐而毋荒、乐以安民”的政治诉求,而不一定是《蟋蟀》的作者。

排除了作者周公的可能性,简文《蟋蟀》的断代似乎愈加困难。

然而,现代高科技的进步给《耄夜》的断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进行了 AMS 碳 14 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结果是公元前 305 ± 30 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由于撰作年代要早于下葬年代,可定清华简成书的下限在战国中晚期之际。^①

至于《耄夜·蟋蟀》的上限,我认为可以从用韵和用词两个方面找到线索。

第一,用韵。观《耄夜》的五首诗句,篇篇有韵,《乐乐旨酒》大部分押东韵,整首诗东阳合韵,《乐乐旨酒》押幽韵,周公所作《明明上帝》整首诗合阳韵,《蟋蟀》则大部分押铎韵,全诗铎药月合韵。而,《周颂》为西周初年的颂歌,三十一篇,全部无韵者八篇,部分无韵者十一篇,占了总数的大部分,其年代较早的几首诗如《时迈》、《酌》、《桓》、《般》、《武》、《清庙》、《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噫嘻》^②等都是不押韵的,且句数杂乱,句式不整齐。前人认为周公所作的《时迈》、《思文》,《时迈》全无韵而《思文》第一句与第四句押职部韵,第二三句押真部韵,后四句无韵。王力先生在《诗经韵读》中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西周初年诗人写诗还不一定押韵^③。故从这点看,《耄夜》的形成年代不大可能在西周初年。

第二,用词。词汇的选择与运用通常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所以用词为断代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然而西周时期管理酒政的官员有萍氏、司觶

① 刘光胜:《清华简〈耄夜〉考论》,《中州学刊》2011年第1期。

② 曹建国:《论清华简中的〈蟋蟀〉》,《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③ 王力:《诗经韵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1页。

和酒正,没有司正一职。《周礼·秋官》:“萍氏掌国之水禁。凡酒、谨酒。”《周礼·地官》:“掌宪市之禁令,禁其斗器者,与其鬻乱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萍氏、司鬻,都是对付民间饮酒的。对贵族统治者自己则设酒官,有限度、有节制地供给王室和大臣们用酒。《周礼·天官》特设酒正一职:“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为公酒者亦如之。”属下还有酒人、浆人等。“酒人掌为五齐三酒,浆人掌共王之六饮。”酒监这个职务最早见于《诗经·宾之初筵》“既立之监,或佐之史”,而《宾之初筵》为卫武公(约公元前853—前758年)时期的诗歌。

“王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旨酒”是美酒的意思,最早见于西周晚期的爻季良父壶铭,“用盛旨酒”,而春秋时期《诗经》里使用的频率最高。如:《诗经·小雅·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经·小雅·正月》:“彼有旨酒,又有嘉殽。”《诗经·小雅·桑扈》:“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诗经·小雅·车鞳》:“虽无旨酒,式饮庶幾。”《诗经·大雅·鳧鷖》:“旨酒欣欣,燔炙芬芬。”《诗经·周颂·丝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诗经·鲁颂·泂水》:“既饮旨酒,永锡难老。”但到了战国时期“旨酒”的用法又绝少了。

“任仁兄弟,庶民和同”,郭沫若在《孔墨的批判》一文中认为“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和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①。清人阮元在《揅经室集·〈论语〉论仁论》中言:“‘仁’字不见于虞夏商《书》及《诗》三颂、《易》卦爻辞之内,似周初有此言,而无此字。其见于《毛诗》者,则始自《诗·国风》‘洵美且仁’……盖周初但写‘人’字,周官礼后始造‘仁’字也。”事实上,在春秋前的古文献中存在那一例外——《尚书·周书·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但是在清华简《金縢》中同样的内容却对应的是“是佞若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佞,《说文》:“巧谄高才也。从女,仁声。”阮元认为:“言予旦之巧若文王也。巧义即佞也。佞以仁得声而义随之,故仁可为佞借也。古者事鬼神当用佞,金縢之以佞为美,借‘仁’代‘佞’者,因事鬼神也。”^②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仁出现在春秋后期。

地理名词的细究也为判断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祝佗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唐叔……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7页。

② 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11—1013页。

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①而《史记·晋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两种说法在谁赐予叔虞封地上有不同，但是有一个共识——“唐”是周成王弟叔虞的封国。

《汉书·地理志》云：“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为晋侯。”^②《诗谱》亦曰：“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③即，叔虞的儿子燮将唐改国号为晋。

所以，晋是由唐而来，后于周公、武王时期。《毛诗序》云：“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④由此可知，《唐风》实为晋诗。而此前已证《耆夜》成文年代先于周公。故，《耆夜》早于《诗经·唐风》。

且《耆夜》顾名思义是耆地之夜。《吕氏春秋·慎大》记载：“武王‘封尧之后于黎’。耆（黎）地后入于晋。”^⑤也就是说，耆地本为尧帝之后的封地，在晋国成立后并与晋，这又成为《耆夜·蟋蟀》早于《唐风·蟋蟀》的力证。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文字上的推断是存在这局限性的，因为不排除会有例外的存在，但是综上所述，我认为《耆夜·蟋蟀》完成时间很可能在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晚期之间，比《唐风·蟋蟀》的春秋中期早。所以说简本《蟋蟀》可能是《唐风·蟋蟀》的仿作不是没有根据的。

四、试论“孔子删诗说”

对于“孔子删诗”问题的争论，学界从未停息过，然而始终未得出定论。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

①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4—2135页。

② 班固：《汉书》卷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8页。

③ 《毛诗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本，第360页。

④ 《毛诗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本，第360页。

⑤ 李学勤：《清华简〈耆夜〉》，《光明日报》2008年8月3日第12版。

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及至唐代,孔颖达在《诗谱正义序》中以:“如《史记》语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怀疑:“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对于删诗的大讨论至此开始。

主张“删诗”派观点有三:第一,古代诸侯国众多,大小国家有 1800 多个,若每一国皆有诗,则总数何止 3000 首。故孔子从前人已收录诗中选取 305 篇编为集作为教科书是可能的。第二,司马迁博览群书,史记为信史,且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加可靠。第三,出土文献却中有一些通篇内容、情感都与今本《诗经》相同的诗,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与《唐风·杕杜》皆感叹他人虽众,不如兄弟,在主题、思想上极为相近。故孔子编诗时去掉了其中内容重复而又价值不高的少数诗篇,也是有可能的。

而主张“不删诗”派论据有五:一、孔颖达由传书所引诗句大多见于定本《诗经》,且今之所见逸诗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而质疑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认为孔子删诗不可能删去全诗歌的十分之九。二、孔子自己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只说正乐,未说删诗,且孔子修诗是在“自卫返鲁”之后,而此前孔子谈到“诗”时,也称“诗三百”。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诗旨》中说:“夫子反鲁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此盖史迁误读‘正乐’为‘删诗’云耳。”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于此年(公元前 544 年)适鲁观乐,鲁乐师所奏十五国风、雅、颂的各部分,编排与今天的《诗经》大体相同。而孔子当时只有 8 岁,根本不可能删《诗经》。四、春秋时期,庠序之讽诵,列国士大夫之赋诗言志,典籍记载多出于今本《诗经》,可见《诗》在当时崇高的地位,孔子无权删诗且仅凭孔子一人之力也不足以达到这样的影响。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九中称:“《诗》至于三千篇,则轲轩之所采,定不止于十三国矣。而季札观乐于鲁,所歌风诗,无出十三国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未必定属删后之言。况多至三千,乐师蒙叟,安能遍其讽诵?窃疑当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于三百余篇而已。”^①五、《诗经》中有不少“淫诗”,不符合

① 朱彝尊:《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孔子礼乐仁政的思想,故《诗经》非孔子所删。

而《耆夜·蟋蟀》的出土,无疑为“孔子删诗”说提供了新的线索。在前文中,笔者已把《唐风·蟋蟀》与《耆夜·蟋蟀》做了细致的比较,虽然两者在句式、押韵、情感上存在一定区别,但是其在形式、用词、大意上的相似度仍然令人诧异。如果说真的如笔者推断简文《蟋蟀》创作早于诗经《蟋蟀》,那么“孔子删诗说”就很可能存在一种新的可能性——在编修《诗经》时,孔子对前代的诗作做了文字上的改动、润色,去其繁冗,提高了诗歌的艺术水平、使之更加朗朗上口。

近年来一些出土的文献作品,如,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和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中都存在不少与今本《诗经》相似度极高的诗作。如《小雅·皇皇者华》“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与《逸周书·太子晋解》中的“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漻漻,取予不疑”,又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中的

……兄及弟淇,鲜我二人。

多薪多薪,莫如霍苇。多人多人,莫如兄弟。

[多薪多薪,莫如萧苕。多人多人],莫如同生。

多薪多薪,莫如松梓。多人多人,莫如同父母。

与《唐风·杕杜》:

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饮焉?

有杕之杜,其叶箐箐。独行裊裊。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饮焉?

两首诗都有表达他人虽众却不如亲人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法制下的亲族血缘意识。但《唐风·杕杜》无论是从语言的生动形象,还是人生哲理的深沉,都略胜一筹。

所以说,我们可以推测,孔子很可能并未进行删诗,而是在编修《诗经》时,对当时民间流传的尚不完善的诗篇进行细致的加工,删其拙劣,取其精华,使之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进而编入教材。

(作者 韩一舟,2009级; 指导教师 刘光胜)

清华简《金縢》与 《尚书·金縢》比较研究

洪莉媛

绪 论

《金縢》是西周时期的奴隶主统治者宣扬和歌颂周公旦一次宗教性的政治行为的一篇神话式的传说,在下列几点上说得明白:(1)周公为生病的周武王替死,把祷告的祝册藏在金縢柜中;(2)周武王死后,因管叔等的流言,周公避居东都,并写了一首《鸛鸣》诗赠与成王;(3)上天用风雷示警,使周成王醒悟,把周公接了回来。对于这几点在清华简《金縢》和《尚书·金縢》等相关古籍里是相同的,但《尚书·金縢》并没有明确讲明周公“居东”的内容,由于资料缺乏,近世对于周公“居东”的时间、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周公言“我之弗辟”的“辟”字含义、风雷示警时间、成王迎周公的背景、《鸛鸣》诗的象征意义等一系列问题争议不断,长期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清华简《金縢》为我们研究周公居东等关键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一、清华简《金縢》^①与《尚书·金縢》^②异文校勘

1.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清华简作“武王既克𪚩(殷)三年，王不瘳(豫)又(有)厯(迟)”。

谨按：《史记·鲁周公世家》沿承二年说，清华简所见为战国传本，顾颉刚据《尚书》叙事风格认为《尚书·金縢》“叙事部分可能是后来东周史官补充进去的”^③，从清华简增“武王”二字，也可看出成书较晚于《尚书·金縢》，故在史料的可信性上《尚书·金縢》更有价值。

2. 植璧秉珪

清华简原整理者作“秉璧𡗗珪”。《〈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金縢研读》云：“‘𡗗’字楚简多读为戴。”沈培先生有文章专门讨论过。清华简的“𡗗”字也当读为戴。

谨按：圭形窄长，故可云植，而璧为圆形，无法称“植”，故《尚书·金縢》此处不如清华简“秉璧戴珪”合乎常理。

3. 遘厉害疾

谨按：“遘”：遇、遭。“害”：患，与遘同义。“厉”字，孔训“危也”，谓严重、危险。今本更合理，与后文周公“以己代武王之愿”更契合。

4.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

清华简作“是佞若巧能，多才多艺”。

谨按：《史记·鲁世家》作“旦巧能”，盖“巧”、“考”古字相通。廖名春：“是”为连词。表示因果关系，相当于“因为”。

5. 敷佑四方

清华简作“𡗗(匍)又(有)四方”。

陈民镇、胡凯采日本内野本作“𡗗右三方”，其中“敷佑”，《书古文训》亦作“𡗗右”，日本足利本及唐石经俱作“敷佑”。俞樾《群经评议》已指“敷”与“溥”、“普”通用，释作“普有四方”，顾颉刚据1976年出土的《墙盘》有“匍有上

①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75页—84页。

②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清人注疏十三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7页—101页。

③ 顾颉刚：《尚书校释译论》提出这一说，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53页。